

教师必读文库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总主编 冯克诚



(第五辑·第十四卷)

[现] 廖世承

(1892 年 ~ 1970 年)

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学苑音像出版社

G40
248

教师必读文库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第五辑·第十四卷)

[现] 廖世承

(1892年~1970年)

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
学苑音像出版社 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五辑/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6. 5

ISBN 7-80135-741-8

I. 中... II. 北... III. 教育名著-作品综合集-中国文学 IV. 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1430 号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五辑

[现]廖世承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
学苑音像出版社

★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印刷

200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1/32 印张:195 字数:5066 千字

ISBN 7-80135-741-8

全二十册定价:526.00 元(册均 26.30 元)

(ADD: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邮局 10 号信箱)

P. C.: 100024 Tel: 010-65477339 010-65740218(带 Fax)

E-mail: webmaster@BTE-book.com Http://www.BTE-book.com

教师必读文库
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出版说明

教师职业化、专业化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教师职业素质素养达到基本要求和提高,是当前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急迫要求。为此,我们组织相关专家重新系统地、较完整地遴选、编译、评注了这套适合中小学教师职业阅读的《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其编选原则和方针是:

1. 从古至今,各时代、各地区和国家有代表性,和对当代及后世教育发生直接影响的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品、经典论述。教育家的教育实践风范和教育思想对当代和后世的影响远大于制度影响,同时,对现实教师的成长也有借鉴和参考作用。作为职业教师,总听说、总涉及但在学校图书馆里总缺乏的那些著作是我们这次系统编选的重点。

2. 全套分中国卷 100 种、外国卷 100 种,每二十种为一辑,共十辑,约 200 种,同时出齐。每种含教育家的生平、教育事迹、教育成就、教育思想评析和经典教育论著选读及注解解读导读两部分。这对于全面深刻和原原本本地了解学习、运用教育家的思想和著作是十分有益的。

编者

2006 年 4 月

目 录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第五辑·第十四卷

[现] 廖世承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上 篇

廖世承教育活动

廖世承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 (1)

下 篇

廖世承教育文论选读

- 关于新学制草案中等教育课程之研究 (17)
- 本校编制新学制课程的经过情况 (36)
- 三三制问题 (42)
- 中等学校的学级编制 (49)
- 性教育与中学校 (61)
- 治教育者须具三种资格 (70)
- 科学的诊断与新法考试 (84)
- 今后中学教育的问题 (94)
- 中学实施道尔顿制的批评 (103)
- 关于农村教育 (116)
- 中学生指南 (119)

青年的烦闷与出路	(127)
毕业会考有什么价值	(132)
我们为什么要办消费合作社	(138)
我对于改革学制的意见	(140)
教育改造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151)
人格与品性的养成	(162)
赠毕业同学	(170)
谈谈训育上的实际问题	(172)
教 与 学	(182)
对中小学教育改制的意见	(192)
关于中学校的课外作业问题	(197)
中学教育改造的基本原则	(202)

廖世承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

廖世承(1892年6月14日——1970年10月20日)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中等教育专家,字茂如,上海市嘉定县人。

(一)

20世纪初期,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和劳苦大众为推翻清王朝统治而斗争的年代。青少年时代的廖世承,在其父母教育和影响下,关心国事,喜欢读书,告诫自己将来定要做个好人。1908年,他高小毕业后考入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即原南洋公学)中院学习。在几年肄业中,他课余常独自坐在床上,静静的看书,晚上时与同班知友谈论国事,往往至灭灯后犹不肯睡。闲时与父亲谈,耳闻父亲在圣约翰大学任教时寄洋人篱下的情景,不满意君主政体,憎恨帝国主义侵略,一心寻求民族自立的道路。就在辛亥革命成功、清廷被推翻那一年,中学五年改为四年,廖世承于是提前毕业。1912年暑假,北京清华学校到上海招生,录取者均有出洋深造之望。可是他家亲友中有人介绍他到湖南教书,月薪40元。他父亲征求他的意见,他说“现时家况虽然艰苦,尚未至山穷水尽地步,我总抱定得寸则寸,得尺则尺的决心,不愿我的求学历程半途而废”。他的父亲同意其要求。这样,廖世承与同班知友在校外借一住所,闭门苦读。当清华学校录取揭晓时,廖世承与同班其他8位同学被录取。三年后将要毕业时,他准备出国攻读教育学和心理学,决心献身于教育事业。他的这一选择,遭到许多亲友的竭力反对,说什么“教育事业是最没有出息的,一生吃粉笔灰,如学‘经济学’、‘银行学’,才是‘金饭碗’”。然

而,亲友的劝阻和反对,没有动摇廖世承学教育、立志终身搞教育的决心和信心。

1915年,廖世承和同学诸人一起赴美留学,在勃朗大学插入二年级学习。他知道双亲盼他早日做事,所以不愿长期留学。为此,他总想每学期多读几个学分,在四年内读毕了六年学程,而且成绩优异。在第四学年时,因他得第一居多又是研究心理学和测验的,经教授特别保举,被荣誉学会理事会讨论通过吸收为属科学一种的荣誉会员,获得金钥匙。在勃朗大学不仅获得了学士与硕士学位,而且还通过了博士及格考试,并准备为博士论文收集材料。后因经济拮据,加上父亲催促,于1919年回国。博士论文在国内写就后寄去,所以他的博士文凭回国两年后才得到。廖世承是我国现代最早获哲学博士学位的留学生。

(二)

廖世承1919年回国,同年8月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南大学)教育科教授,主讲教育心理学、中学教育等新课程,很受学生欢迎。教书不到两个月,附属中学内部发生了问题,便由他担任附中主任。尽管他要主持校务,但仍坚持一面教学一面研究,几乎每年写书一册。1924年出版了《教育心理学》、《中学教育》等专著,是我国最早的两本高师教科书。

我国最早的心理实验室,于1920年分别在北京高师与南京高师建立。廖世承参与南京高师心理实验室的创建工作,并在我国首先用智力测验法测验投考的学生和在校学生。1921年,他与陈鹤琴在测验基础上合编出版了《智力测验法》一书。这是我国最早的智力测验著作。为推进测验事业和完善测验标准,在廖世承主持下,东南大学附中与中国中等教育协进社合作、编制了初、高中用的各科测验,并组织学生以东大附中为基地,又到江浙两省十多个城市的学

校,按编制的测验进行试测,及时将测验情况写成报告予以公布。1925年,他与陈鹤琴又合编出版了《测验概要》一书。该书“详述无遗”,被公认为“测验最简便的用书”。由于廖世承等人的积极提倡和推行,“我国之测验事业,遂日形发达”。在当时编制的各种测验中,一般只用于个人,而廖世承编制的测验,不但用于个人,还用于团体,四、五十名学生可同时进行;不但用于文化方面学科,还用于道德意识、时事政治。这是测验方面新的创造和发展,对推广教育测验和心理测验起了很大作用,因而被国内外学者誉为“廖氏之团体测验”。美国测验专家麦柯尔承认,当时中国心理学家编制的各种测验,“至少都与美国的水平相等,有许多竟比美国为优”。廖世承以他创造性地进行科学研究取得的重要成就而成为二十年代在我国提倡和推行各种测验的主要代表,已载入中国教育史册。

廖世承在东大任教时,还积极参与以改革学制和课程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改革运动。他对在全国实行新学制即“六三三”制“主张最力”。1921年夏,他在苏州等地讲演“中小学沟通”问题时,反复阐述、坚决主张采用“六三三”学制。所论与同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七届会议之旨意不谋而合”。1922年改行新学制,中小学“六三三”制方案是廖世承所手草。后来,他通过东大附中的实践和对国外学制的研究,又去济南、武汉等地调查,全面分析了对新学制赞成与反对的意见,认为“六三三”学制既顺应时代潮流,也符合青少年个性发展,利多弊少。针对主张以四二制为通则的意见,他在《新教育》、《教育杂志》、《教育汇刊》、《中等教育》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在《关于新学制一个紧急的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三三制是适合个性的、顺应时代潮流的”,它既可使“各段教育相衔接”,又可“顾全升学与职业两种”。他坚决主张中学以三三制为原则,采用选科制和分科制,并在东大附中认真加以实施,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学制改革和课程改革。

在20年代,国内各种教育主张和改革方案竞相兴起。面对各种

主张,廖世承不人云亦云,而重视教育实验。他主张对新学说、新主张应先搞实验,“实验有效,然后再谋推行”,“从事教育的人,当注意实地研究,不应作趋时论调”。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当道尔顿制刚介绍到我国的时候,几乎有风行一世的样子,不仅一些中学校试行,而且有些高小、初小学校也试行,有些人把道尔顿制说得有百利而无一弊,并攻击班级教学。为了“比较道尔顿制与学科制之优劣”,并“唤起国人对于实验之兴趣”,廖世承在东大附中组织 10 余名教师,进行一种比较实验。通过实验,他于 1924 年,即道尔顿制创造者柏克赫斯特来华之前,写出了《东大附中道尔顿制实验报告》一书。该报告详尽地记述了实验计划、过程、方法及教员和学生所发表的意见,根据实验结果作出了结论,指出:道尔顿制的特色“在自由与合作”,但根据我国具体条件很难实行道尔顿制;而“班级教学果然有缺点,但也有它的特色”。1925 年,廖世承在《中华教育界》杂志上发表了《中学实施道尔顿制的批评》一文,列举了在师资、教材和设备等七个方面的困难,指出在中国不能实行道尔顿制。由此他认为,“现时的教育理论及设施,均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所以科学的实验,当尽力提倡”。廖世承反对盲目搬用外国的经验,主张从国情和科学出发,创立我国自己的教学制度和办法。这种思想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与此同时,廖世承还就如何施行新学制、办好中学校,进行了较全面的实验和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主张。例如:如何编制新学制课程;怎样培养具有良好习惯和道德的学生;怎样搞好学校管理,以及中学生心理、生理的变化和个性差异,教学怎样才能“适应学生的能力和兴趣”,“科学的考试方法和计分法”的实行等等,他都做过实验和研究。这些实验成果,集中反映在他编的《施行新学制后之东大附中》一书中。该书“以事实为主,兼及理论”,“对于本校各种实验事业,均有详细解释”,并“载有各种表格及统计图表”。廖世承通过实验得出如下认识,认为治教育者至少须具三种资格:“(1)略谙教育原理,(2)确

具实验精神,(3)有恒心。三者缺一,即不能收美满之效果。惟不谙教育原理,故宗旨不定,俯仰随人,徒知剽袭成法,而不知独抒己见。惟缺乏实验精神,故因循敷衍,每事盲从,矜新奇以眩世,而不问究竟。至于喜近功,乏远虑,有良好主张不能始终贯彻者,则无恒心故也。”廖世承是我国教育实验的热心倡导者和坚决执行者。

(三)

1927年春,廖世承离南京东大,到上海新创办的光华大学,任该校教育系主任、附中主任和大学副校长。在他初进光华时,南北各大学均有函来接洽,有人邀请他到江苏省校任校长,也有人电邀他担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秘书长,有人请他担任中央大学教育处处长,市工部局也以华人教育处处长一席与他。对这些邀请,廖世承均辞谢未往。1931年,他为了集中精力办好附中,“力辞副校长兼职”。廖世承在光华十余年中,立足于光华附中,面向整个中等教育,对中等教育的历史、现状和理论,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成为我国著名的中等教育专家。

在这个时期里,廖世承的理论和实践贡献是:第一,对中等教育历史的研究。他在《中华教育界》、《光华大学半月刊》和商务印务馆刊印的《三十五年中国之教育》专辑上,就中等教育的发生、发展和地位,先后发表了《中学教育》、《三十五年来中国之中学教育》、《十年来中国之中学教育》等长篇专论。他从总结历史经验入手,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认为我国中等教育没有上轨道的主要原因:一是社会和政治动乱的影响,二是师资缺乏训练,三是中学功课太繁重,四是缺乏从实地去做的精神。只有克服这些问题,教育才能上轨道。

第二,对中学教育改革提出了许多理论观点和实施主张。廖世承在《为全国中学校请命》、《中学教育改造的基本原则》、《教育改造

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人格与品性的养成》、《教与学》等几十篇文章中,对中等学校的学制,课程与教材,教育与教学,教师与学生,中学校与职业教育,学生的课外活动,办学与社会,等等,都有程度不同的论述。他说:一个国家军备的优劣,财富的盈亏,政治的消长,实业的盛衰,文化的升降,与中学校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中学要把整个的青年作为训练对象,把服务社会、献身国家,作为教育训练的目标,使学生增进知识,陶冶情感,养成能力,健全身体。为此,他提出中学教育改造的基本原则应是,①一国的中学教育制度必须适合国情和地方的需要,中国幅员辽阔,整齐划一的制度,不易适应各地的特殊情况。②在未有各种类型不同的中学及选拔制度未能施行尽如人意之前,中学对于学生的升学与就业准备须两者兼顾,不能只顾升学。③中学教育的宗旨在于充分发展各个人潜在的能力,使学生成为最快乐和最有用的人。④中学教育的对象是千变万化的青少年,所以一切措施不能有固定的方式,必须不断研究、改进教育工作,从实际出发搞好学生的品行、健康和知识的教育,应把这三者看得一样重要。⑤中学的课程、教材、教法和教育人员的态度,与中学效能、学生的成长,关系极大,必须精心研究,讲究科学方法,具有好的服务精神。

第三,重视职业教育与民众教育。廖世承认为,一个现代的国家,人人应有职业,人人应受良好的公民训练。首先,“在职业学校内,应有普通的学程,而在普通中学内应尽力矫正以往的错误,注重实用的知识”。其次,要重视对学生的职业指导和职业陶冶。他说:“人生必须有职业,职业的陶冶,现今在中学校渐趋重要的地位”,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不能隔膜和疏远,应使学生有“职业知识”、“职业技能”,他们才能随时适应环境,对社会有充分的贡献。再次,要发展农村教育和平民教育。他认为,农村教育要发展,当然先要解除农民经济上的压迫,宽裕农民的经济,而办教育谈教育的人,“对于农村教育明知其重要,但往往都向城市中讨生活,很少躬亲陇启,

伏处乡村,与农民之弟为伍,认定农村教育为终身职业”,所以“中国办学数十年,而农村教育依然不能发达”。

第四,谋师资的改进。廖世承在办教育中十分重视择师,千方百计聘良师任教。他说:“一个学校的最后的成功,就靠着教师。无论宗旨怎样明定,课程怎样有系统,训育怎样研究有素,校风怎样良善;要是教师不得人,成功还没有把握。所以现今的中等学校学生,不单是要择校,并且要择师。谋师资的改进,自是中学教育的要图。”这个思想无论在他办东大附中、光华附中及后来办高师时始终十分明确,把择良师放在办学的首位。当时他邀集了一批第一流的教师到附中任教,如教语文的王遽常、周哲肫、顾苕丞、张振鏞、马厚文,教英语的徐燕谋、吴遐令、董小培、吴清、郭淦生;教数学的倪若水、桂叔超、金马丁;教理化的胡梅轩、沈昭文、胡昭圣;教史地的姚舜卿、津子端、陶绍渊、邢鹏举等。这样一批教师任教,使光华附中办得很有特色、很有质量,在30年代初的上海中学会考中,连续两届成绩名列金市第一,教育质量与上海中学、南洋模范中学并驾齐驱。对此,教育部门曾以“设备完善,办事认真,成绩斐然”等评语多次嘉奖。1936年,教育部指定全国优良中学9所,对中学的各项问题进行实验,光华附中亦是被指定的学校之一。

(四)

1938年,教育部为培养中学师资,配合抗战建国国策,依照全国临时代表大会通过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筹设独立师范学院。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推荐,聘请廖世承为筹委会主任。廖世承欣然赴任。1938年儿月,国立师范学院正式成立,廖任院长。国立师院设在交通不便,几乎与外界隔绝的湖南安化县兰田镇西。在筹备过程中,廖世承“奔走率职,用承厥志”。他从择院址到草拟国立师院组织大纲,从主持师院考生口试到聘请各科教员,从草拟学院

开办费预算书到采购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从组织人员兴建校舍到沟通上下左右关系,从主持院务到呈报教育部……,依靠当地力量,带领大家艰苦创业,在“重冈复岭”之地办起了一所国立师范学院。在任职期间,尽管长沙几次战争,常德被围,形势紧迫,但该院始终如常,弦歌不辍,至1943年,各项建筑如办公楼、图书馆、大礼堂、联谊社、学生宿舍、教学楼、浴室、运动场、发电场、游泳池及教职员新村先后建成。1944年春,长沙、衡阳相继沦陷,学院由兰田西迁溆浦,在当地各机关团体的协助下,继续开学上课。廖世承团结大家,在努力改善生活条件和教学设施的同时,还不遗余力地邀集当时全国知名的专家、教授任教,如钱基博、钱钟书、孟宪承、郭一岑、朱有光、高觉敷、汪伯明、马宗霍、黄子道、宗子威以及王撹、刘佛年、陈一百等,都曾在该校担任教职。该校在全国历届高校学生学业竞赛及毕业论文竞赛中,成绩优异,成为抗日战争期间一所有影响的高等师范学校。现在不少高校的领导骨干和专家教授,当年都曾在该校就读。国立师范学院“以树立师范学院独立办理之先声”被载入史册。

廖世承在国立师院任院长期间,尽管院务繁重,但他对中国师范教育悉心研究,撰写了《师范教育与抗战建国》、《师范学院的使命》、《抗战十年来中国的师范教育》等长篇文章。他对我国师范教育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作了系统的考察,提出了如何办好师范教育的较系统的主张。他明确指出:“教育方面最重要的,当然是师范教育。没有良好的师资,各级教育,都不会上轨道。”为此,他提出:第一,师范应以独立设置为原则,附设于大学利少弊多,取消高等师范教育更是无当。第二,应明确师范学院的使命。他说:师范学院的使命,一是树立普遍的共有的教育信念,二是培养同情与纯爱,三是进行专门职业训练,四是学术方面专科训练,五是倡导实验,六是对社会教育的指导。第三,师范训练应重严格。他说:培养学生应严格要求、严格训练,使他们“不单是要知识好、方法好,而且要有专业道德——有责任心、忍耐性、仁爱心,真诚、坦白、乐观、谦虚、公正诸美德。”第

四,要有好的师资。他认为“师范学院之理想教授,须学识宏通,而且富有教学经验,具有教育热情。然而,此种理想难以达到,但对现有教师可量才使用,即学术渊博殚心研究者可教高年级的课;有相当专门学问、富有教学经验而熟悉中等学校各科情形者,可任实习导师;教学能胜任而能谨慎负责者,可教工具学科或低年级之课。”这样,“学生工具教育得有基础,而专门学问亦有师承,再加以优良之实习指导,出而为人师,自不致有覆悚之虞矣。”第五,教育理论与实际教育打成一片。师范学院应既是实验的中心,也应为教育指导的中心。只有这样,师范学院在教育界的地位,自然增高,教育的专业训练,也无人敢忽视了,学术也能得到普及。

廖世承从历史和现状中深切感到,“教育为百年之大计,立国之根本,其重要政策,非万不得已,不轻易更张”。他还说,我在后方各省跑,来回跑了三万数千里路,“最使我感到不安的,就是知识阶级和民众的生活隔得太远。享受愈富厚,隔离愈疏远,几成了公例。我们所享受的,是他们的血汗,但是他们享受到我们什么呢?……以前学校的门关得太紧了,以致对于民力的伟大,民生的疾苦,没有深切的了解。关了门办学,不能称为‘学校’,只能称为‘修道院’。我们要的是学校,不是修道院。我们要把全国修道院的门打开了,变成民众的学校。这副重担子,又非师范学校来挑不可。”可见,廖世承对民族教育和办好师范教育的真切感情。

(五)

抗日战争胜利,因学院迁址,廖世承于1947年由湖南回上海,受聘于刚复校的光华大学,先后任该校副校长和附中校长。全国解放后,任光华大学校长,一直到1951年7月。这段时间正值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制度之际,廖世承选择了跟共产党走的道路,使光华大学获得新生。他要求光华大学全体师生员工“为建设新光华新中国而

努力”，并明确指出：“我们有一条大路，就是努力改造自己。改造的重点，在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以及建立良好的民主秩序。最主要的，还须加强师生的政治教育，改造思想。”廖世承的行动为人民政府改造光华大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1年夏，光华、大夏等院校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廖世承任副校长。从1956年起，他先后任上海第一师范学院院长，上海师范学院院长，直至逝世。

在旧中国，廖世承饱经风霜数十载，新中国诞生后，他才真正见到光明，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开始走上了前进的道路。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按照国家和人民的要求办学校，以培养新时代的人民教师为己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

在建国初期，廖世承就很有见地地说：“教育工作是国家建设的基础工作，师范教育是基础工作的基础，师大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培养一批又一批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师。”在解放后的十多年中，廖世承努力按照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办好高师，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教育人才。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的发展和所取得的成就，都包含着廖世承的辛勤劳动和创造性的工作。

廖世承领导社会主义高等师范学校，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其主要特点是：

- 1、在工作中坚决拥护共产党领导，努力贯彻党和政府的教育方针与政策。他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一切工作必须有共产党领导”。“矢志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廖世承的坚定信念。在学校工作中，他紧紧地依靠党，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他不只口述、笔著，而且付诸实际行动。担任上海师范学院院长期间，他与党委领导的关系亲密无间，合作共事。他以切身体会告诉人们，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彼此真诚相见，党的领导同志以同志态度对待一个非党同志，而作为一

个非党知识分子,要全心全意拥护社会主义,诚心诚意接受党的领导,切实做好本职工作。他在实践中体会到,只要为了人民利益,不应计较个人得失;揭露工作中的矛盾并不是削弱党的领导,也不是表现党的软弱,正是显示了党的领导正确。只有这样认识问题,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同党的关系才能处理好,位置才能摆正。

2、经常教育师生热爱教育事业,热爱教师工作,要做光荣的新时代的人民教师。廖世承常常用自己选择教师职业,始终坚持在教育岗位上的事实和认识,来教育师生热爱教育工作。他说:培养青少年的工作是人生最有兴趣、最有价值的一项工作,因而始终没有动摇过,也没有后悔过,……在新社会中,我对于教育的信念更坚强了,深切体会到教育是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有力工具。教育的好坏,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所以教师工作的影响非常深远,崇高而伟大。为此,他写了《做光荣的新时代的人民教师》一文,用客观事实和自己的认识,澄清了青年学生对学师范、当教师的一些模糊认识。

3、重视思想教育和师范生良好习惯的养成。他在办学过程中多次提出,思想教育不能单靠政治课,其他各学科的教学都应渗透,加强对学生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的教育,帮助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他对学生说:每个人要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集体主义精神,每个人要自觉遵守纪律,服从集体利益。对于教师必须尊敬,对于同学必须友爱,具有优良的品质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成为新型的人民教师。

4、重视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学和训练,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他认为,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一方面取决于教师的质量,另一方面则是学生自己的努力,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知识面太狭窄,会妨碍独立思考;要独立思考,必须有广博的基础知识。教师既要把“三基”传授给学生,也要培养学生的能力,此外,还要加强教学检查。他说:教学检查要年年搞,有重点的